

# 试论国民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对工农运动的推动

◎王明前

**摘要:**在国民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有专门的工农运动课程。在东征和省港大罢工中,黄埔师生积极参加和支援工农运动。黄埔师生紧密把握时代脉搏,高度肯定工农运动对国民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革命武装与工农运动休戚与共的共生关系。

**关键词:**黄埔军校;工农运动;扶助农工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62(2014)04-0023-04

国民党“一大”后,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黄埔军校作为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重要成果应运而生。对于黄埔军校与工农运动的关系问题,史学界已有关关注。<sup>[1]</sup>其实,在国民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有专门的工农运动课程。在东征和省港大罢工中,黄埔师生积极参加和支援工农运动,并且紧密把握时代脉搏,对扶助农工政策多有理论阐述。针对目前现有成果多侧重描述具体事件,而忽视发掘理论问题的现状,笔者不揣浅陋,拟从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的工农运动、黄埔师生积极参加和发动工农运动,以及黄埔师生对“扶助农工”政策的理论阐述三方面,考察黄埔军校与工农运动的关系,以期增加学术界对黄埔军校研究的学术认知。

在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中,专门开设有讲述工农运动伟大意义的课程,以加深师生对“扶助农工”政策的理解。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规定政治教育应“使学生彻底了解革命运动是起于工农群众的物质要求,革命的胜利亦必须靠工农群众的努力始能有所保障”。<sup>[2]191</sup>在《官长政治教育计划》

中,列有陈其瑗的《广州工人运动之实况》、邓中夏的《省港罢工之经过》、周佩箴的《广东省政府与土地问题》、陈克文的《本党农民运动概况》、罗绮园的《广东的农民运动之经过》、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之成绩》等关于工农运动的讲座。<sup>[2]199-200</sup>军校的《训练士兵入伍教育计划及其纲要》,要求在政治教育方面,要讲授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各三次。其中农民运动,要讲解农民运动的意义、中国农民运动的概况、中国国民党与农民、农民与国民革命四项内容。<sup>[2]201-202</sup>工人运动,要讲解劳工运动的历史、中国工人运动的概况、工会之组织与作用、中国国民党与工人、工人与国民革命五项内容。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共产党员恽代英组织编印了九种政治讲义,其中有《本党与农民运动》、《本党与劳动运动》两种讲授工农运动的教材。<sup>[3]345</sup>

## 一、黄埔师生积极参加和支援工农运动

以培养革命军人为己任的黄埔军校,把参加和促进工农运动作为自己天然的责任。广大黄埔师生自觉投身于工农运动,“很少有黄埔学员不积极参加的群众集会、工人或学校的会议”。在与工农运动相

收稿日期:2014-06-31

作者简介:王明前,男,博士,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福建 厦门,361005。

结合的过程中,“军校的政治活动能力不断提高扩大,并且同共产党人工作于其中的工会联系起来,军校成了广州群众性社会政治活动的领导者”。<sup>[4]494</sup>黄埔师生在东征、北伐军事斗争过程中,积极发动和参加工农运动。在经历了“沙基惨案”的洗礼后,黄埔师生积极支援省港罢工和同时期的工农运动,与工农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军校为号召东江人民参加和响应国民革命,发布《告东江人民书》,宣布:“本校党军认为被压迫人民欲解除自身痛苦,必须自身奋起,与革命军同其动作,然后此革命军之力量,乃能强大,革命军之行动乃能愈益谋得人民之真利益”。宣言表示东征军要帮助东江人民实现民权主义承诺的民主政治:“被压迫人民欲解除自身痛苦,既自其赞助革命从事革命起,次之便应进而取得政治之管理权”。具体而言,“凡本校革命军队所达之地,必尽其力之所能助革命人民以获得县长民选之权,同时更希革命人民亦应努力宣传此民选之要义,使民众得为自动自觉之要求,以促进县长民选之实现”。宣言承诺在驱逐陈炯明后,“被压迫人民宜首先求解除自身之种种束缚”,如“工人应依各职业差别组织各种工会,农民应依国民党宣布之农会法成立农民协会”,等。<sup>[2]243-244</sup>军校教导团积极发动东江群众参加革命。“留守此地同志均往各乡村向民众宣传,居民中有名望者极愿代雇伏役运送子弹行李”。<sup>[2]252</sup>东征军《告农民同胞书》也深切表达了黄埔师生对广大农民的深刻关切:“我们陆军军官学校的军队特别和农民亲密,我们曾经和广州各乡农民开过许多次联欢会。但是陈炯明是残害农民的魔鬼,在他占据的地方,农民是不能安居的”。宣言称:“我们来为你们打陈炯明,为你们消除压制你们的魔鬼”。<sup>[2]293</sup>在另一份名为《敬告农民》的布告中,军校师生对农民的痛苦痛心疾首:“你们深受贪官污吏、地方劣绅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摧残与压迫的痛苦,比任何阶级都利害得多”。为激发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的情绪,布告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贪官污吏的罪恶本质:“贪官污吏、地主、劣绅是社会的寄生虫,帝国主义与军阀是结了解不解之缘,更是促使或帮助贪官污吏地主劣绅压迫你们摧残你们的主动者”。布告呼吁:“农民们想脱离此奴隶式的生活吗?请拥护国民政府!赞助国民革命军!”<sup>[2]294</sup>在《为东征告农民书》中,军校师生表达了同样的关怀:“国民党所管的地方,特别保护农民;我们陆军军官学校的军队特别和农民亲密。我们曾经和广州各乡农民开过许多次的联

欢会”。<sup>[3]76</sup>在东征军《敬告工人书》中,黄埔师生首先表示:东征“有实现本党保护个人利益之党纲”的意义,并且通过“党军十分之八为工人与农民,其余皆属失业学生。彼以前亦同样似诸君今日受陈贼种种之压迫之痛苦,同样似诸君之生活艰难,不能支持致失业失学而前来当兵”的言辞,以期唤起与工人共同的社会认同,呼吁工人“亦本杀贼的怀抱,去助我们杀贼而完最后之事业”。<sup>[3]75</sup>

东征军得到东江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东征军东征日记载:“本日(1925年3月2日)在海丰出城,即遇无数农民,联袂偕来,更前行,所遇愈多,且多执青天白日及农会旗帜。……或问本日何日,则知为陈逆解散二年有余之海丰农会举行恢复之会员大会日也”。<sup>[2]297</sup>为支持海丰农民运动,1925年3月3日,东征军调陈烈去海丰农会训练自卫军。<sup>[2]298</sup>

在第二次东征中,东征军宣传队以扶助工农运动为己任,“随时辅助并发展农工之组织,并尽力为之解决一切痛苦问题”。<sup>[2]311</sup>

1925年6月25日,英帝国主义制造“沙基惨案”,黄埔师生与爱国工人、市民和学生一起喋血珠江。7月1日,黄埔师生通电全国,表示:“政府应注意于为国事奋斗,因罢工而失业之工人妥为安插,善为编制,以冀有益于抗英运动”,真切表达了支援罢工工人的意愿。9月,军校选派二期生邢定汉等十五人帮助建设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以实际行动支援罢工。<sup>[2]285-286</sup>

随着罢工斗争的深入,黄埔师生与罢工工人的革命情谊日益深厚。1926年2月,军校中共特别党部发表援助省港罢工周宣言,高度肯定罢工对革命的贡献。宣言称:“我们的中国国际地位被抬高,帝国主义不敢轻意欺辱我们中华民族。这是谁的功劳呢?完全广东全省的不肖军队,都被革命军打倒,全省和平有了保障,这是谁的功劳呢?是工人帮助革命军所致”,因此,“罢工胜利,就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胜利,也就是国民革命成功的一部分”。<sup>[2]287</sup>1926年2月8日,军校内共产党人组织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发表援助省港罢工宣言,表示:“要本着工农兵学商联合的意旨,实力援助罢工,使香港帝国主义屈服于我罢工条件之下”。<sup>[3]98</sup>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拥护省港罢工宣言呼吁:“各阶级的民众,为保护本身利益,为解放民族自由,都应该团结起来,建立巩固的联合战线,厉行封锁政策、排斥政策,在物质上及精神上积极援助罢工工友,以求得最后之胜利。罢工胜利后帝国主义之凶焰可以稍杀,沙基各惨案可以

昭雪,国民政府之政权可以巩固”。<sup>[2]288-289</sup>1926年8月25日,军校召开拥护省港罢工大会,提出扩充纠察队并补充其武装,严密封锁沿海、建设黄埔商埠以及与英帝国主义绝交等支援罢工的措施。<sup>[2]291</sup>

1926年9月2日,军校以全体党员的名义向罢工工友表示:“愿竭我们能力予以相当的物质和精神的援助并且矢志为工友们武装的后盾,因为罢工的失败,我们通通灭亡,党国灭亡,我们通通灭亡”。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呼吁师生参加为拥护罢工组织的售章募捐活动,要求“每一个官生士兵夫同志,在他的可能范围内,至少要销四毫的纪念章一枚,校官和将官的同志,至少每人要销五元纪念章一枚或三五枚。至于在这最少的范围内,尚有踊跃输将,多重捐助者,同人等当以十二份的诚恳表示欢迎”。<sup>[3]330</sup>

黄埔师生还积极支援同时期的其他工农运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聘请黄埔一期生任文君担任其第四届学员的军事训练工作。<sup>[2]295</sup>军校政治部于1926年6月派伍文生等六人担任东莞宝安农民自卫军的政治及军事训练工作。<sup>[2]298</sup>1926年10月,军校选派四期毕业生三十余人,参加农民运动干部特别训练所,学习农民运动理论,期满后分赴各县训练农民自卫军模范队。<sup>[2]290</sup>1925年5月,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积极声援南顺丝厂女工罢工,表示:“此次诸姑姐妹因受东家压迫而罢工,我辈青年军人极表同情与赞助”。<sup>[3]275</sup>1926年9月13日,军校师生还发表通电,积极声援上海纱厂工人罢工。宣言称:“事关反抗帝国主义,凡我国民,责无旁贷,此时更应继续五卅的精神去奋斗”。<sup>[3]110</sup>

在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中,黄埔师生与广大工农群众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1926年5月,黄埔军校召开的欢迎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二次全省农民大会和第六次教育大会代表的欢迎会,成为工农兵大联合的舞台。校长蒋介石代表军校发言表示:“担当革命工作的革命分子,有二部分人:一是有武装的,一是无武装的。有武装的,是军队;无武装的,是工农学界”,因此他认为:“真正的革命军,要受工农学界的指挥监督才对的”。<sup>[3]437</sup>李立三代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致答词表示:“广东全省的农民工人,年来统统拥护国民革命军,就是因为国民革命军真正能够保护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缘故”。<sup>[3]440</sup>苏兆征代表省港罢工工人表示:“我们罢工工友因为有农工学界一致联合起来给予我们的帮助,尤其是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更不惜牺牲一切,以图接济,所以终至

不为他的阴谋所破,能够长期奋斗,以至今日”,因此“现在经过了这一次的奋斗,在罢工时期中,已经帮助了政府得到军政、财政、民政的统一了”。<sup>[3]441</sup>

## 二、黄埔师生对“扶助农工”政策的阐述

通过积极参加工农运动实践,黄埔师生,特别是共产党员,逐渐加深了对“扶助农工”政策的理解。许多师生对这一伟大政策做了深刻的理论阐述。

首先,黄埔师生高度肯定工农运动对国民革命的伟大意义,论证革命军队参加和支持工农运动的现实必然性。

中共特别党部执委李永光在阐述“扶助农工”政策的意义时指出:首先,“中国底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剥削之外,还要加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他们在这重重压迫之下,其生活之痛苦,已达极点;革命的要求,亦很激烈”。其次,他从农民所处社会经济关系的角度阐述农民革命的必要性:“在这客观的事实上看来,他又握有足制全国人于死命的经济力量;并且在落后的中国乡村里,布满了很浓厚的封建色彩”,因此,“欲把这类革命途程上的障碍物铲去,实只有勇敢的而又居全国人口之最大多数的农民,才能负担这个责任”。再次,他在指出农民固有弱点的同时,引申出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独特而伟大的革命品质的结论:“农民虽有破坏旧制度的力量和革命的要求,但是他是长期沉沦于封建制度下面的人,常有复古的和守旧的倾向,不能坚决地向着社会进化的大路走去。故必须要以富于政治斗争的工人阶级去领导他们”。中国工人阶级“所受压迫甚深,他们所受的痛苦,亦甚残酷。因之,他们的革命要求,亦较任何阶级为强烈。他们除了革命外,简直不能解决生活问题,只有革命才有他们的出路”,加上“他们大多聚处于商务中心、政治中心的都市里,一旦罢起工来,就会使统治阶级根本倒台”。最后,他断言:“国民革命,除了唤醒农工,使他们自动地参加实际斗争外,实无他项良法”。<sup>[3]409-410</sup>恽代英也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例,高度肯定产业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第一,他们是一般穷光蛋,因为是穷光蛋,所以没有甚么挂念,对于革命事业特别勇敢;第二,他们是直接受军阀或中外资本家压迫,因为是直接受压迫,所以仇人相见,分外眼明,敌对的态度很明显;第三,他们全路工人都是在一个管理机关之下,所受政治经济的压迫是一致的,因为所受压迫是一致的,所以容易产生同仇敌忾的观念,一致的与压迫势力相反抗;第四,他们的工作与居处是集中的……所以容易互相宣传煽动,亦

容易互相督促约束,没有散漫的民众比得上他们;第五,他们在铁路或工厂矿山上做工,占交通或生产事业的重要地位,因为所居地位重要,他们容易觉悟自己一种武器有一部分实力,可以与压迫阶级相抵抗”。基于以上五点特征,“产业无产阶级遂成为最容易觉悟的革命势力,遂成为最富于革命性的阶级力量”。<sup>[3] 417-418</sup>

1926年“二七”纪念日,军校特别党部表示纪念“二七”的意义,在于“由‘二七’联想到现在,深知欲达到我们的目的,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而工人之觉醒,乃是国民革命成功的一种要素”。<sup>[3]</sup> 97 在纪念孙中山诞辰周年宣言中,军校特别党部表示:“要想国民革命成功,非全国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有了组织,有了力量,起来参加革命不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相媾宰制下之中国,尤非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共同奋斗不可。巴黎公社之失败,二月革命之失败以及辛亥革命之失败,都是历史上之教训”。这一认识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联系历史经验,对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关键作用给以充分肯定。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杨其纲在阐述纪念列宁逝世二周年意义时指出:之所以要纪念列宁,是“因为他真能代表最大多数的工农群众而奋斗,为最大多数工农群众开创社会革命之基。中国工人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实为中国革命之主要力量。欲使中国革命成功,工农群众得到解放,必须取法于列宁的工农联合政策”。<sup>[3]401</sup> 1926年12月,军校第五期炮工两科学员在移驻武昌途中,热情讴歌“扶助农工”政策的伟大意义:“因为农工是占中国民族的最多数,只有农工联合起来,革命力量才会增加,革命势力才算巩固。也只有农工联合使农工生活改善,中国的实业才能发达。也只有最多数的农工联合起来,军阀才得根本推翻,帝国主义才得根本打倒”。共产党员安体诚于1927年1月25日召开的军校欢迎罢工代表会上指出:“中国最多的是农民和工人,所以中国的革命非工人农民起来参加不能成功的。但是农民人数虽多,他们的知识落后力量散漫。在此帝国主义猛烈进攻之下,能急起反抗的只有工人,所以农民是革命的中心,而工人却是革命的领导”。<sup>[2]292</sup>

其次,军校师生阐述了革命武装与工农运动休戚与共的共生关系。

黄埔一期生、共产党员蒋先云在经历东征战火的洗礼后表示:“革命军须为农工及全民众的解放而奋斗,尤其在军事行动时期,应充分保护工农的利

益”。<sup>[2]262</sup> 在1925年“五一”节,黄埔师生表达了工农兵群众大联合的愿望:“我们工农兵三位同病相怜的好朋友,活要活在一起,死要死在一堆,才觉得痛快。现在为解除自己压迫痛苦与自全计,唯一方法就是采用革命手段,工农兵三角大同盟。联合在一条联合战线上去,努力向国际资本主义与国内军阀压迫之敌人同时下总攻击动员令”。<sup>[3]78</sup> 校长蒋介石也在《青年军人》发刊词上表示:青年军人应“站在最前线的地位,树立我们一支国民先锋的革命军,来继续京汉路工已死同志之功业,尽我们救国救民的本分……推倒军阀。驱逐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根本势力”。<sup>[3]355</sup> 时任党军第一师党代表的周恩来同志,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会上,指出革命军队与工农运动休戚与共的关系:“兵与匪都是失业的工人与农民,他们是与我们工农受同深的痛苦,惟有受痛苦的人,才能体恤痛苦的人。所以要解除兵与匪的痛苦,惟有受痛苦的工农阶级去打救他”。因此,“要使兵士明白怎样与工农联合,那么军队里头,要有很多明白的份子;知道兵士自身是由工农失业而来的;在工农方面,亦要有明白的份子,加入军队里去,使军队能为工农保障的军队”。<sup>[3]429-430</sup> 1927年3月,武汉分校各队党部、直属小组联席会议发表宣言表示:“农人工人供给我们以生活的一切,我们现在所以能在学校安然学习,是全靠他们。他们的利益,便是我们的利益,他们的灾害,也便是我们的灾害。我们是与农工等一切民众同其利害,所以我们与农工在解放运动中,互相扶助,反对一切摧残农工利益的人”。<sup>[3]145</sup>

综上所述,在国民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有专门的工农运动课程。在东征和省港大罢工中,黄埔师生积极参加和支援工农运动。黄埔师生紧密把握时代脉搏,高度肯定工农运动对国民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革命武装与工农运动休戚与共的共生关系。

#### 参考文献:

- [1] 卜德文.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对广东工农运动的支持[J].岭南文史,2013,(1).
- [2]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年)[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 [3] 陈以沛,邹志红,赵丽屏.黄埔军校史料(续篇)[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 [4] 广州近代史博物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国民革命与黄埔军校[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张颖